

# 王阳明心学的澄明、贯通与夯实

——论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的独特贡献

李承贵

(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 210023)

**【摘要】**薛侃是王阳明的大弟子,但学界较少关注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的贡献。基于对薛侃相关文献的考察和分析可知,薛侃在学术上对阳明心学作出了独特贡献。首先表现在继承王阳明心学的基本观念上,如在良知即先天判断、“万物一体”基础的论证等方面;其次表现在对王阳明心学的某些核心观念的分辨和明晰上,如在“良知作为主人翁的资格”、“知行合一”的两种形式、“万物一体”的关怀与境界旨趣等方面;再次表现在创造性地发展、夯实阳明心学的内涵上,如对“致良知”的“致”之思想意识层面的强调、对“知行合一”之本体性论证、对“见在”即本体与工夫的统一之界定等方面;最后表现在对王阳明心学四大基本观念的贯通上,如以“见在”为枢纽,对“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四个基本观念进行贯通,言简意丰地阐述了四者复杂而有机的关系,认为“心”或良知是“万物一体”之基础,“万物一体”也是“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基础,而做到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也就实现了“万物一体”,从而将王阳明心学体系脉络更为深刻、更为生动地呈现出来。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关键词】**薛侃 王阳明心学 澄明 贯通 夯实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24)03-0178-12

薛侃(1486—1546),字尚谦,明朝潮州府揭阳人(今广东揭阳市人)。曾跟随王阳明学习六年:“先生亲师取友凡六年,始归于家。”<sup>①</sup>亲炙阳明之教,深得良知学宗旨。那么,作为王阳明早期入室弟子,薛侃在学术上对阳明心学有怎样的贡献呢?由于薛侃没有大部头的著作,为人又极谦卑低调,以致其在学术上对阳明心学的贡献少有人问津。但检阅相关文献不难发现,薛侃在学术上不仅忠诚地继承了阳明心学的基本观念,而且对阳明心学的主要命题进行了辨析;不仅对阳明心学“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四个基本观念进行了疏通,而且在内容上对这些基本观念进行了夯实与发展。因此,在阳明文化研究如日中天的今天,发掘、凸显薛侃对阳明心学的学术贡献既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亲民”便是“明明德”

“明明德”出自《大学》第一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那么,

收稿日期:2024-01-09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孔学堂)“王阳明心态思想研究”(18GZGX04)

<sup>①</sup> 薛侨:《中离公行状》,载《薛侃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422页。

薛侃是如何理解的呢?薛侃说:“‘明明德’工夫只在‘亲民’上。阳明先生晚年发得如此亲切,初年犹未说到此。”<sup>①</sup>认为王阳明是将“亲民”视为“明明德”的工夫。这种理解与王阳明是一致的。王阳明说:“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sup>②</sup>在王阳明看来,“明明德”“亲民”是一,而且,“明明德”是体,“亲民”是用。阳明说:“明德、亲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亲其民,亲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体也;亲民,用也。”<sup>③</sup>“明明德”的目标是为了“亲民”,而“亲民”的作用是彰显明德。因此,“明明德”与“亲民”体用同源。

薛侃认为,《大学》强调“不亲民,不足以明德”,是以“万物一体”为理论基础的。“天人、物我原非两个。《大学》不亲民,不足以明德,以此。”<sup>④</sup>那么,王阳明是否也认为“不亲民不足以明德”之观念是建立在“万物一体”上的呢?回答是肯定的。王阳明说:“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孝之德明矣;亲吾之子,以及人之子,而慈之德明矣。明德亲民也,而可以二乎?惟乎明其明德以亲民也,故能以一身为天下;亲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为一身。夫以天下为一身也,则八荒四表,皆吾支体,而况一郡之治,心腹之间乎?”<sup>⑤</sup>就是说,如果要使“德明”,其孝就必须从己之父推及人之父、其慈必须从己之子推及人之子,故“明明德”“亲民”不能分离为二。因此,只有将其明德落实于“亲民”,才能以一身为天下;只有以“亲民”彰显其明德,才能以天下为一身。而无论是“以天下为一身”,还是“以一身为天下”,都只是证明八荒四表皆为一体。因此,“不亲民不足以明德”的根据在于“万物一体”。

依阳明,“明明德以亲民”,那么与孔子“修己以安百姓”是不是一个意思呢?薛侃通过对“修己以安百姓”与“明明德以亲民”的比较,表达了自己的认识。

润问:“《大学古本》云:明明德亲民,犹云:‘修己以安百姓’。此恐犹是初年之见。”先生曰:“汝谓修己、安百姓还是二项邪?”曰:“安百姓毕竟似在修己后面。”曰:“修己便是安百姓,不能安百姓,不谓之修己,如‘笃恭而天下平’亦是如此。所以说‘不诚无物’,内外只是一个。”<sup>⑥</sup>

在薛侃看来,“修己”与“安百姓”是一,不能“安百姓”,不足以称“修己”;“明明德”与“亲民”是一,不能“亲民”,怎么可以叫“明明德”?而“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因此,“明明德亲民”就是“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与“安百姓”没有先后内外之分,“明明德”与“亲民”也没有先后内外之分。因为“修己”“笃恭”“明明德”都是“诚”,“诚”则有物,所以内外是一,所以“修己以安百姓”,所以“笃恭而天下平”,所以“明明德以亲民”。值得注意的是,薛侃的解释完全继承王阳明而来。阳明说:“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

① 薛侃:《云门录》,载《薛侃集》,第4页。

② 王阳明:《传习录上》,载《王阳明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2页。

③ 王阳明:《书朱子礼卷》,载《王阳明全集》上,第313页。

④ 同①书,第10页。

⑤ 王阳明:《书赵孟立卷》,载《王阳明全集》中,第1128页。

⑥ 同①书,第5页。

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sup>①</sup>可见,薛侃认为“明明德以亲民”与“修己以安百姓”是表述不同但含义相同的命题,而这个认识与王阳明是完全一致的。

应该说,薛侃关于“明明德”与“亲民”关系的理解与王阳明是如出一辙的:他们都认为“明明德”与“亲民”是体用关系;都认为“不亲民不足以明明德”,而其根据是“万物一体”;都认为“明明德以亲民”就是“修己以安百姓”。质言之,他们都认为个体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必须一致。因而他们主张的真谛在于:道德修养必须表现在对百姓生活的改善上,而致力于百姓生活的改善。也就是,道德修养的完成,从而以实际、积极的内容充实了道德修养。可见,薛侃与王阳明一脉相承。

## 二、不自欺即是“致良知”

良知学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王阳明说:“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sup>②</sup>那么,薛侃对阳明良知学做了怎样的理解呢?薛侃认为,良知既是心之本体,也是心之发用,人人皆有。薛侃说:“盖心无体,知之良处即其体也;心无用,良知随处不息即其用也。人人具足,个个完成,但自蔽耳。去其蔽则自存存不息矣。何为蔽?是非得失乱之也。”<sup>③</sup>但是,人迷于是非得失而使其本有之良知被遮蔽,因而必须去除“蔽”。薛侃的这个理解与王阳明完全一致。阳明说:“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但人不知存,则有时而或放耳。虽昏塞之极,而良知未尝不明,但人不知察,则有时而或蔽耳。”<sup>④</sup>值得注意的是,薛侃将“心之良处”视为体,将“良知随处不息”视为用,从而由体和用的角度对心进行了明确规定。既然“知之良处”是心之体,所以心不空;“良知随处不息”是心之用,所以心不僵。也就是说,心所以成为心学的核心命题,乃是由于良知的充实和规定。

而作为心之本体的良知,同时是一种“明觉”。薛侃说:“良知者,吾心之明觉也。常明常觉便是作得主,作得主则一刻万年,一念百虑矣。”<sup>⑤</sup>即良知乃心之“明觉”,如果良知能够恒在普照,即意味着具有了主人的身份;具有了主人身份的良知,也就是心之“明觉”无时不在;良知既然无时不在,其积极效应便是“一刻即万年、一念即百虑”。这种认识与王阳明也是一致的。阳明说:“然良知之在人心,则万古如一日。苟顺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则所谓不知足而为屨,我知其不为蕘矣。”<sup>⑥</sup>就是说,如果顺良知而推行于生活实践,那么,即便不看脚样去编草鞋,也是不会编成筐子的。值得注意的是,薛侃言良知之常明常觉才作得主,从而进一步明确了良知做主人的条件;阳明曾说良知是主人翁,但没有提及具有怎样的条件才能成为主人翁。阳明说:“良知犹主人翁,私

① 王阳明:《传习录上》,载《王阳明全集》上,第2页。

② 王阳明:《传习录下》,载《王阳明全集》上,第113页。

③ 薛侃:《与杭诸友》,载《薛侃集》,第304-305页。

④ 王阳明:《传习录中》,载《王阳明全集》上,第69页。

⑤ 薛侃:《研几录》,载《薛侃集》,第36页。

⑥ 王阳明:《寄邹谦之二》,载《王阳明全集》上,第225页。

欲犹豪奴悍婢。”<sup>①</sup>薛侃认为只有常明常觉,良知才能真正成为主人翁,从而丰富了阳明的思想。

薛侃认为,作为心之“明觉”的良知也是一种先天判断。薛侃说:“良知者,人心自然明觉处也。见父知孝,见子知慈,此良知也。遇寒知衣,遇渴知饮,遇路知险夷,此良知也。当恻隐自恻隐,当羞恶自羞恶,当恭敬自恭敬,当是非自是非,此良知也。人惟欺此良知,则争讼诈罔,无所不至。若依而充之,知是则行,知非则止,有则曰有,无则曰无,人人太古,处处义皇矣,竟有何事?”<sup>②</sup>只要良知在场,是则是,非则非,善则善,恶则恶,不需要依靠经验来判断。良知是人生来已具的“明觉”,此“明觉”即善恶准则。此认知、判断能力出自生命本能,这种本能的“明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薛侃说:“良知随处自觉,觉其是则行,觉其非则止,无先而迎,无后而将,如日中天,廓然顺应,蔽斯去矣。”<sup>③</sup>良知的觉知、判断能力是不需要学习的,良知呈现即可。薛侃的这种认知与王阳明也是一致的。阳明说:“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sup>④</sup>良知如明镜,善恶美丑灿然若现。阳明又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sup>⑤</sup>良知是心之本体,因而心具有了道德本能,见父知孝、见兄知悌,纯是自然的流露。可见,良知是一种先天判断,对薛侃、阳明而言是共同的认知。

因此,人一旦觉悟了良知,便意味着大彻大悟,便意味着无事不觉,所以也可说良知穷尽了天下之理、穷尽了天下之事、穷尽了天下之学。薛侃说:“‘良知’二字,以理言之,尽天下之理;以事言之,尽天下之事;以学言之,尽天下之学。”<sup>⑥</sup>既然良知之外无理、无事、无学,那么持守良知即可,无须外求。薛侃说:“此道,良知尽矣。此学,致良知尽之矣。应之为事,成之为物,备于此矣。信得真是,不假外求。”<sup>⑦</sup>薛侃显然不是实际地认为良知囊括了所有的道、所有的事、所有的学,而是说如果做到了“致良知”,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其他所谓理、所谓学、所谓事,最终目标不就是“致良知”吗?薛侃这样定义良知的特点与王阳明也是完全一致的。王阳明说:“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sup>⑧</sup>

如上所言,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是“致良知”。那么,薛侃对“致良知”又有怎样理解的呢?薛侃说:“‘良知’乃是知得是非处,知得是非一毫不容自欺,便是‘致’。”<sup>⑨</sup>薛侃认为,良知即是非决断处,无一毫自欺;“致良知”之“致”,就是“知得是非一毫不容自欺”,即在判断是非的时候,不存一丝一毫之偏见,从而良知是没有任何一丁点妥协的。

① 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载《王阳明全集》下,第1286页。

② 薛侃:《良知》,载《薛侃集》,第391页。

③ 薛侃:《与杭诸友》,载《薛侃集》,第304-305页。

④ 王阳明:《传习录中》,载《王阳明全集》上,第79页。

⑤ 王阳明:《传习录上》,载《王阳明全集》上,第7页。

⑥ 薛侃:《云门录》,载《薛侃集》,第8页。

⑦ 同③书,第304页。

⑧ 王阳明:《与马子莘》,载《王阳明全集》上,第243页。

⑨ 同⑥书,第8页。

这个解释也与王阳明一致。阳明说:“君子学以为己,未尝虞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sup>①</sup>此即说,良知坦坦荡荡、光明磊落,没有丝毫自欺。可见,阳明将“不欺”视为良知的基本品质,薛侃毫无遗漏地继承了下来。值得注意的是,薛侃解“致良知”之“致”为“知得是非一毫不容自欺”,这就意味着“致良知”首先必须在观念上自觉到不存在丝毫自欺,否则不能“致良知”。这就在“致良知”实践向度的基础上增补了理论向度,从而使王阳明“致良知”的内涵更加完整、丰富。

### 三、“知行合一”的两种形式

“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重要观念之一,相关论述非常多。如阳明说:“‘知行合一’之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故不得已而为此补偏救弊之言。”<sup>②</sup>又说:“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sup>③</sup>可见,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核心精神是反对“离知行为二”。薛侃不仅继承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而且有所推进。

其一,“知行合一”之“知”“行”层级。由于有人将王阳明“知行合一”之“知”“行”与常识意义上的知、行混淆,薛侃不能不加以纠正。

问:“‘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似以知行分两件。”曰:“此‘知’说得浅,乃闻见之知,如《论语》‘知之次也’之类。大抵知行本体原离不得,人之所造乃有浅深,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日用而不知’,‘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又是知难行易,皆非知行本体矣。”<sup>④</sup>

在薛侃看来,知行有深浅之别,“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之知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知行,“百姓日用而不知”之知行,“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之知行,都属浅,即都属常识意义上的知行,所以都不能视为本体意义上的知行,不能认为是哲学意义上的知行,因而不能认为是知行的本体。但王阳明“知行合一”之“知”“行”属本体意义上的范畴。因此,王阳明“知行合一”是就本体意义而言的。

曰:“《中庸》生知、学知、困知,安行、勉行、利行,亦分言之,何也?”曰:“‘知’‘行’二字须要还他,但析不开耳。言知便有行在,言行便有知在。行是应迹处,知是主张处。知行即是乾坤万物之生,得气于天,成形于地,岂有先后?知属乾,行属坤,故曰:‘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此‘知’字下得好,便是知行之知。朱子训着‘主’字,‘主’便兼有行意,不知于‘知’‘行’二字如何看得隔碍。”<sup>⑤</sup>

薛侃认为,知行是无法拆开的,因为讲知的时候便有行在,反之亦然;从功能上看,行是

① 王阳明:《传习录中》,载《王阳明全集》上,第84页。

② 王阳明:《与道通书四》,载《王阳明全集》下,第1331页。

③ 同①书,第47-48页。

④ 薛侃:《云门录》,载《薛侃集》,第20页。

⑤ 同上书,第21页。

实行处,知是主张处,这就是所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而在《周易》中,知属乾,行属坤,乾坤不离而化生万物,故“知行合一”;乾坤即阴阳,乃万物化生之本原,具有本体义,因而“知行合一”也具本体义。依照薛侃的解释,“知行合一”不仅是事实的存在,也是价值的存在,更是本体的存在,是事实存在的抽象与升华。阳明说:“某今说个知行合一……知行本体,原是如此。”<sup>①</sup>可以说,薛侃的解释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是知行本体”之说的进一步澄明,从而明确了王阳明“知行合一”命题的本体层级。

其二,“知行合一”的两种形式。薛侃认为,之所以出现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误解,不仅因为混淆了不同层次的“知行合一”,也因为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知行合一”。薛侃说:“行者知之运,知者行之主,皆学之工也。非知焉行,非行焉学?故未善,学而善;已善,学而能至善,皆知为之主,不待合而一也。彼不一者,斯有辨矣。有德性知行,有真闻见知行。德性者何?一念惺惺,常存常应,随处精进,故《易》曰‘成性存存’,语其行也,知在其中矣。孟子曰‘贤者昭昭’,语其知也,行在其中矣。真闻见者何?如见牛齧棘,见牛,知也;齧棘,行也。牛去,齧棘亦去矣。及闻孟子之言,心有戚戚,闻,知也;戚戚,行也。闻已而戚戚亦已矣。是之谓合一。彼其口耳之知,未有必行之志,徒涉猎以资辞说、助博洽耳。间有欲行而又不胜利欲之心,则虽知亦影响之知,非行之主之知也。”<sup>②</sup>薛侃认为,从问学角度看,知行皆是工夫,没有知不能行,没有行不能学。因此,人如未善,可以通过学习变善;人若已善,可以通过学习趋于至善。这就是说,从作为问学的工夫而言,知行本就是合一的。因此,如果有人认为知行不是合一的,那大概是因为混淆了这两种意义上的知与行。一种是德性意义的知行。这种知行,是指心有念,常存常应,随处精进,如成性存存,即言其行,而知在其中;再如孟子所谓“贤者昭昭”,即言其知,而行在其中。也就是说,德性层面的知行必然是合一的。另一种是闻见意义的知行,比如看见牛颤抖,看见牛是知,颤抖便是行,但是牛走之后,颤抖也就消失了;等到听闻孟子之言,“心有戚戚”,“闻”是知,“戚戚”便是行,但是,“闻已则戚戚亦已矣”,此也是“知行合一”。不过,这种只有口耳之知、没有必行之志的“知行合一”,仅仅能“资辞说、助博洽”而已。即便偶尔想行,但因为不能战胜利欲,也只能是无根据之知,不是行主宰的知。在这里,薛侃提出了两种形式的“知行合一”,一种是德性意义上的“知行合一”,一种是闻见意义上的“知行合一”;而且,德性意义上的“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见闻意义上的“知行合一”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这是因为,只有德性之知行,才是真知行,因为有了“私意”的知行,绝不可能是真知行。薛侃的解释,完全合乎阳明的意思。阳明说:“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sup>③</sup>薛侃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界定为德性意义的

① 王阳明:《传习录上》,载《王阳明全集》上,第5页。

② 薛侃:《答余石楼书》,载《薛侃集》,第290页。

③ 同①书,第4页。

观念是合乎阳明本意的。王阳明说:“知乃德性之知,是为良知,非知识也。”<sup>①</sup>因此,薛侃的这种区分,不仅进一步明确了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性质,而且明确了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容,即属于道德意义上的“知行合一”,从而极大地深化了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认识和理解。

#### 四、万物因“仁”而一体

“万物一体”是阳明心学的另一基本观念,主要表达的是王阳明的政治伦理思想。王阳明晚年对“万物一体”进行过反复而深刻的论述。那么,薛侃是怎样理解这个观念的呢?

其一,万物何以为一体?王阳明提出“万物一体”论之后,常有人对“万物一体”的基础质疑。薛侃关于“万物一体”的基础的观点与王阳明是一致的,那就是“灵明”是“万物一体”的基础。薛侃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天地间许多灵明,都在人身上,便是心,万物便是四肢毛发,故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混然与物同体。’”<sup>②</sup>这就是说,天地间有许多“灵明”,这个“灵明”即是心,都在人身上,万物则是四肢毛发,所以说人是天地之心,所以说天人、物我本来就是一个,所以说人与万物同体。薛侃又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有形属地,无形属天,统言之曰天地,分言之曰万物。今除了山川土石,何者为地?除了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寒暑,何者为天?除了吾心之灵,恶知天地?恶有万物?故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五伦本于一身,庶徵应乎五事。一感即为一物,故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曰‘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sup>③</sup>所谓天,就是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寒暑;所谓地,就是山川土石,所以天地与万物是统分而言,实际上是一体。而天地万物皆由心而明而有,因为没有心,则无天地万物,所以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所以孟子说“尽性尽人性尽物性”,因为一体也。概言之,万物所以“一体”,因为心也。可见,薛侃与王阳明一样,认为万物所以“一体”是因为“灵明”。“万物一体”是因为心之认知能力发现,是因为心之恻隐情感联结,从而将自然的“万物一体”升华为价值的“万物一体”。因此薛侃强调,“万物一体”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客观的事实:“天地万物皆吾一体,非只是悬空如此说,原来本是如此,且如人未生时,这个知觉何所在?毕竟在天地万物上。为学正要复此本体。”<sup>④</sup>“万物一体”是天地万物之本来面貌,为学也只是致力于恢复这个“本体”而已。薛侃的这个观点与王阳明是一致的。阳明说:“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sup>⑤</sup>这个“灵明”是天地鬼神的主宰,是天高地深的裁判,“灵明”不能离却天地万物鬼神,天地万物鬼神不能离却“灵明”,所以人与天地万物鬼神没有间隔,所以是“一体”。

① 王阳明:《语录》,载《王阳明全集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261页。

② 薛侃:《云门录》,载《薛侃集》,第10页。

③ 薛侃:《研几录》,载《薛侃集》,第75页。

④ 同②书,第17页。

⑤ 王阳明:《传习录下》,载《王阳明全集》上,第141页。

其二,“万物一体”论旨趣何在?如上所论,“万物一体”的基础是“灵明”,而这个“灵明”其实就是仁,就是明德。王阳明说:“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sup>①</sup>而且,明德或仁是“万物一体”的体,“亲民”是“万物一体”的用。王阳明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sup>②</sup>因而“明明德是体、亲民是用”是“万物一体”的延伸和价值化。既然“万物一体”的体是仁,“万物一体”的用是“亲民”,这就意味着“万物一体”的旨趣必然是对芸芸众生的悲悯、关怀和仁爱;既然“万物一体”是以仁为基础的“一体”,这就意味着“万物一体”蕴含了对有限的超越。薛侃说:“天地间浑是生生不息之意。君子体之,至诚恻怛,莫非爱也。忿怒作恶,全无用处。故教人必爱之则从,惠人必爱之则怀,处人必爱之则亲,刑人必爱之则无怨。”<sup>③</sup>这就是说,“万物一体”洋溢着不息的生意,燃烧着热诚的爱,君子如果能体悟其中的挚诚恻隐之爱,那么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全部作废。因此,以爱教人,人则服从;以爱助人,人则感恩;以爱处人,人则亲近;以爱罚人,人则无怨。可见,在薛侃这里,“万物一体”既是一种充满亲爱、关怀的观念,也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和智慧,因为一旦确立“万物一体”观念,喜怒哀乐、功名利禄、是非毁誉等皆为泡影。不过,薛侃的理解和解释也完全是王阳明思想的继承。阳明说:“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sup>④</sup>这就是说,“万物一体”之“亲民”,就是对万物、对生民以实际行动亲爱之,而且不能有一丝遗漏。阳明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sup>⑤</sup>而且,在王阳明那里,“万物一体”也是功名利禄、是非毁誉的天敌。阳明说:“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原无间隔……本体之欣合和畅,本来如是,初未尝有所增也。就使无朋来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尝有所减也。”<sup>⑥</sup>如果真正能觉悟“万物一体”之意蕴,那就不存在任何间隔,也不会有什么增损、毁誉之牵挂。由此看,薛侃对王阳明“万物一体”论旨趣的解释,完全继承王阳明而来。概言之,薛侃关于“万物一体”之基础的认知,关于“万物一体”之旨趣的理解,是王阳明思想的纯正传承。

## 五、“见在”为核心的阳明心学体系

“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是王阳明心学的四大基本观念。那么,这四大基本观念是怎样的关系呢?薛侃虽然没有专门撰文讨论,但却用一段文字言简意赅地阐述了这四者的关系。薛侃说:“见在而真切而精明谓之工夫,谓之本体;见在而得宜而条理,谓之义理。舍此而谈道义,漫辞也;舍此而言工夫、论本体,是捕风

① 王阳明:《大学问》,载《王阳明全集》中,第1066页。

② 同上书,第1067页。

③ 薛侃:《研几录》,载《薛侃集》,第44页。

④ 同①书,第1067页。

⑤ 王阳明:《传习录上》,载《王阳明全集》上,第29页。

⑥ 王阳明:《与黄勉之二》,载《王阳明全集》上,第216页。

捉影,非真修也。方今之弊,大率从本原上差却。本原者何?万物一体也,万感一心也。应之以一心,视之以一体,形体自泯,彼此自通。即事即心,不必另存心;即心即理,不必别求理。此意不明,便生许多劳扰、许多间隔支离,又从而省克之、而救益之,徒自烦费、自苦恼也。”<sup>①</sup>薛侃文献中“见在”并不常见。另一处是:“思前算后,万端起灭;不将不迎,一念见在。”<sup>②</sup>

“见在”在王阳明的学术性论述中也不常见,但在非学术性论述中却频繁出现。由于“见在”与良知连用,容易引起研究者浮想联翩,所以需要谨慎对待。考之阳明所有作品,属于学术性表述凡三次:其一,“只存得此心常见在,便是学。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sup>③</sup>。“放心”就是“心”丢失不知在何处,就不是“此心见在”;而且,从时空上看,“见在”在过去未来之间,所以是当下、现在之意。因而“此心常见在”,即指本心或良知常呈现于当下。其二,“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sup>④</sup>。由于良知是完满无缺的,不能增损,“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求,不须假借”<sup>⑤</sup>;因而所谓“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并非增加良知的量,而是将“今日如此完美呈现的良知”日后“坚持不懈地实行”之意,即所谓“致良知”,这当然是精一工夫。其三,王阳明说:“良知无前后,只知得见在的几,便是一了百了,若有个‘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趋避利害的意。”<sup>⑥</sup>对王阳明而言,良知充溢时空,当然无前后。“几”一般释为隐微征兆。《易传·系辞下》云:“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那么,“见在”的“几”,应该理解为“关键”或“秘诀”。因此,良知只要“知晓自我如何体现于当下”的关键或秘诀,便万事大吉。诚如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sup>⑦</sup>而薛侃对“几”的解释是:“本非几,无明之火沦于空矣;几非本,脱根之木离于体矣。故曰‘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sup>⑧</sup>本体无“几”,好比无明之火,“几”无本体,好比脱根之木,所以,“几”又有发用之意,但仍含有关键或秘诀之意。综合王阳明关于“见在”的学术性表述,大体上可以判断“良知见在”即“良知当下呈现”之意,或者就是“致良知”。为了凸显和确证“见在”在王阳明学术性表述中的确定意涵,我们对王阳明的著述进行了梳理和排查,发现属于非学术性表述的“见在”有数十处之多,这里罗列部分案例以供参考。

其一,“但闾省无一官见在,人情涣散,汹汹震摇,使无一人牵制其间,彼得安意顺流而下,万一南都无备,将必失守”<sup>⑨</sup>。所谓“无一官见在”,即“没有看见一位官员在

① 薛侃:《答刘晴川书》,载《薛侃集》,第299页。

② 薛侃:《研几录》,载《薛侃集》,第33页。

③ 王阳明:《传习录上》,载《王阳明全集》上,第27页。

④ 王阳明:《传习录下》,载《王阳明全集》上,第109页。

⑤ 王阳明:《传习录中》,载《王阳明全集》上,第96页。

⑥ 同④书,第124页。

⑦ 同④书,第126页。

⑧ 薛侃:《图书质疑》,载《薛侃集》,第158页。

⑨ 王阳明:《与当道书》,《王阳明全集》中,第1101-1102页。

场”。其二，“狼子野心，绝岩峻岭，易以计破，难以兵碎，必须通将调募见在官军二万二千余名，再加议处，咸冗兵以省费，留精兵以守险，待贼饥疲，随加抚剿”<sup>①</sup>。所谓“调募见在官军”，即“调募现有官军”。其三，“今始成军而出，一遇小挫，辄求济师；况动调狼兵，往返数月；非但临渴掘井，缓不及事，兼据见在官兵二千有余，数已不少；兵贵善用，岂在徒多”<sup>②</sup>。所谓“兼据见在官兵”，即“加上现有官兵”。其四，“绩据湖广永州府推官王瑞之呈称，广东差人邀夺等情，已拘知县见在人役”<sup>③</sup>。所谓“已拘知县见在人役”，即“已经拘捕知县看得到的差役”。其五，“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宁王反叛，此系国家大变，臣子之义，不容舍之而去；又闾省巡抚地方等官无一人见在，天下事机，间不容发，故复忍死暂留，为牵制攻讨之图”<sup>④</sup>。所谓“巡抚地方等官无一人见在”，即“各级官员不见一人在场”。其六，“仍将永、保二司官舍头目人等合用廩给口粮等项，查取见在确数各有若干，亦行南宁府查自本府起，至梧州府止”<sup>⑤</sup>。所谓“查取见在确数”，即“查取当下明确数据”。其七，“今访得闵念四等见在宁州界上，告要投招”<sup>⑥</sup>。所谓“见在宁州界上”，即“在宁州界上会面”。其八，“看得原任监察御史，今降合浦县丞陈适，理学素明，志存及物，见在军门，相应差委”<sup>⑦</sup>。所谓“见在军门”，即“表现在军门”。其九，“牌仰指挥赵璇，前去督哨副总兵张祐处，查审各寨稔恶瑶贼，曾否剿绝；各兵见在何处……凡有疾病老弱者，俱令在营将息调理”<sup>⑧</sup>。所谓“各兵见在何处”，即“各兵现在什么地方”。其十，“若见在官兵略以足用，可以不调狼兵，亦免骚扰地方”<sup>⑨</sup>。所谓“若见在官兵略以足用”，即“如果现有官兵尚满足支用”。其十一，“仰分巡苍梧道，公同坐营官张輓，将见在哨守军兵打手人等，分立班次，发与李翱，在于教场轮班操演”<sup>⑩</sup>。所谓“将见在哨守军兵打手人等”，即“将眼下哨守军兵打手人等”。其十二，“计开：宁王郡王将军世子共十六名。见在十四名：宸濠、拱榜……已故二名：拱槭、二世子二哥”<sup>⑪</sup>。这里将“见在”与“已故”相对，因而“见在”即“活着”“当下”之意。其十三，“况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及戴罪三司官、领兵知府等官，俱各见在，封识明白，别无可疑”<sup>⑫</sup>。所谓“俱各见在”，即“都在现场”。以上这些文献充分说明，“见在”就是“看见(人或物)在那里”，或“当下即在”之意，而且好像是王阳明的口头禅。这就提示我们，王阳明使用的“见在”或许没有那么神秘、高深，而且“见在”也不等同良知。不过，即便是“良知当下即是”(类似禅宗“作用见性”)之意，在薛侃这里却表现

① 王阳明：《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贼》，载《王阳明全集》中，第594页。

② 同上书，第595页。

③ 王阳明：《批将士争功呈》，载《王阳明全集》中，第622页。

④ 王阳明：《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暂留养病》，载《王阳明全集》中，第655页。

⑤ 王阳明：《犒送湖兵》，载《王阳明全集》中，第696页。

⑥ 王阳明：《释放投首牌》，载《王阳明全集》中，第650页。

⑦ 王阳明：《牌行灵山县延师设教》，载《王阳明全集》中，第701页。

⑧ 王阳明：《牌委指挥赵璇留剿余贼》，载《王阳明全集》中，第718页。

⑨ 王阳明：《再批攻剿河源贼巢呈》，载《王阳明全集》下，第1200页。

⑩ 王阳明：《批都指挥李翱操演哨守官兵呈》，载《王阳明全集》中，第1210页。

⑪ 王阳明：《行江西按察司知会逆党官眷姓名》，载《王阳明全集》下，第1254页。

⑫ 王阳明：《献俘揭贴》，载《王阳明全集》下，第1257页。

出一种转进,即薛侃已将“见在”等同于良知,并由此展开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四大观念关系的论述,这是非常有趣也非常值得重视的。

那么,为什么说上引薛侃那段话中的“见在”等同于良知呢?在王阳明那里,真切笃实而明觉精察者即是良知:“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纵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sup>①</sup>阳明又说:“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sup>②</sup>因而薛侃谓“见在而真切而精明”,便意味着“见在”即良知。在王阳明那里,良知发用流行而得宜而条理,即是“致良知”。王阳明说:“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sup>③</sup>阳明又说:“集义只是致良知。心得其宜为义,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sup>④</sup>而薛侃谓“见在而得宜而条理”,即谓“良知发用流行合宜且适理”,因而意味着“见在”是良知。王阳明说:“盖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工夫。”<sup>⑤</sup>薛侃谓“见在而真切而精明”,故“见在”亦本体亦工夫,因而也意味着“见在”即良知。薛侃谓“舍此而谈道义,漫辞也;舍此而言工夫、论本体,是捕风捉影,非真修也”,即谓“见在而外无学”,而阳明认为“良知之外便无学”,所以薛侃的“见在”是良知。总之,无论是表述形式还是思想内容,薛侃的“见在”都是对王阳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薛侃已将“见在”等同良知。

薛侃正是以“见在”(良知)为中心,展开了对“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四者关系的思考。王阳明认为,真切笃实是行,明觉精察是知,而且知行相互规定。阳明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sup>⑥</sup>因而薛侃“见在而真切而精明亦工夫亦本体”之说,即意味着“知行合一”蕴含其中,而“知行合一”以“致良知”为目标。王阳明说:“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sup>⑦</sup>这样,薛侃就将“致良知”与“知行合一”贯通了。薛侃认为,如果不能认识和实行“见在而真切而精明谓之工夫,见在而得宜而条理”,那么,“舍此谈道义为漫辞,舍此言工夫、论本体为捕风捉影”,而原因在于“本原上差却”。所谓“本原上差却”,就是不能认识、觉悟、把握“万物一体”之意蕴。因为认识、觉悟、把握了“万物一体”之意蕴,就能做到“一心应物、一体观物”,从而达到形体自泯、声臭自匿、毁誉自消之境界。王阳明说:“所谓心者,非今一团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灵至明、能作能知者也,此所谓‘良知’也……若其本体,惟吾而已,更何处有天地万象?此大人之学所以与天地万物一体也。”<sup>⑧</sup>这样,薛侃又将“致良知”与“万物一体”实现了贯通,而“万物一体”是“致良知”的基础。薛侃认为,如果能够确立“万物一体”的自觉意识,就不会形成“心事为二”“心理为二”的观念,从而“心即理”。阳明说:“今夫茫茫堪舆,苍然

① 王阳明:《传习录下》,载《王阳明全集》上,第114页。

② 同上书,第126页。

③ 王阳明:《传习录中》,载《王阳明全集》上,第48页。

④ 王阳明:《答董沅萝石》,载《王阳明全集》上,第221页。

⑤ 同①书,第139页。

⑥ 同③书,第47页。

⑦ 同③书,第58页。

⑧ 王阳明:《语录》,载《王阳明全集补编》,第283页。

隤然,其气之最粗者欤?稍精则为日月、星宿、风雨、山川;又稍精则为雷电、鬼怪、草木、花卉;又精而为鸟兽、鱼鳖、昆虫之属;至精而为人,至灵至明而为心。故无万象,则无天地;无吾心,则无万象矣。故万象者,吾心之所为也;天地者,万象之所为也;天地万象,吾心之糟粕也。要其极致,乃见天地无心,而人为之心。心失其正,则吾亦万象而已;心得其正,乃谓之人。此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惟在于吾心。此可见心外无理,心外无物。”<sup>①</sup>就是说,万物皆气,但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气之形式逐渐表现为日月、草木、鸟兽、人、心等递进层级;而心是宇宙的精华,是这个层级的顶点,因而宇宙万物万象不过是心之糟粕,而此心即是良知。既然宇宙万物万象的最后归宿是心,所以宇宙万物因为心而为一体,其逻辑推论当然就是“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即“心即理”。因而可以说,薛侃也将“万物一体”与“心即理”贯通了,而“万物一体”是“心即理”的基础。

如上所言,王阳明以“明明德”为“万物一体”之体,以“亲民”为“万物一体”之用,因而“明明德”必然体现为“亲民”,“亲民”便实现了“明明德”。这就是说,明德即良知,“亲民”即“致良知”,由良知到“致良知”,则是“知行合一”,则是“心即理”,亦即“万物一体”。而薛侃的论述表明他深谙此道。这是因为,“见在”是良知与“致良知”的统一,“见在”即本体即工夫,即“知行合一”;但如果不能觉悟“万物一体”,就不能觉悟“致良知即工夫即本体”,也就不能觉悟“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因而觉悟并确立了“万物一体”意识,才能确立“致良知即工夫即本体”意识,才能确立“心即理”意识。这就是王阳明晚年反复申述“万物一体”之原因。这样,薛侃就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万物一体”四个基本观念的血脉贯通了,四者本质上构成了相生相成的有机循环的心学体系。

总之,薛侃在学术层面对王阳明心学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薛侃不仅忠实地继承了阳明心学的基本观念,如在“良知是心之本体”“万物一体”基础的论证等方面,而且对阳明心学的命题进行了分辨和明晰,如在“良知作为主人翁的资格”“知行合一”的两种形式等方面;薛侃不仅夯实了阳明心学的内涵,如对“致良知”之“致”之思想意识层面的强调、对“知行合一”内容的规定、对“见在”即本体与工夫的统一之界定等方面,而且以“见在”为枢纽,对“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四大基本观念进行了梳理与贯通,从而将王阳明心学体系结构及运行脉络更为清晰、更为生动地呈现出来。因此可以说,薛侃不折不扣地践行了自己为传承和弘扬阳明心学的诺言:“尽此生之为,只干此一事足矣。”<sup>②</sup>

【责任编辑:赵小华;责任校对:赵小华】

① 王阳明:《语录》,载《王阳明全集补编》,第282-283页。

② 薛侃:《奉钱德弘王汝中》,载《薛侃集》,第322页。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historical examiner edition), an unpublished copy of Marx's notes from his later years on land ownership in France. The notebook is in German and French, with a cover catalogue in Engels' handwriting and excerpts from the text in Marx's own handwriting.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notebook is detailed data on land ownership, and the excerpts represent a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question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the "Six-Book Plan" in the context of Marx's later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the notebooks are of great valu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Marx's attitude towards the peasant class in his later years.

**Key words:** original manuscript of Marx and Engels; french land ownership; "Six-Book Plan"

###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Expressive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Marx"**

(By HU Siyao, HU Guosheng)

**Abstract:** Karl Heinrich Marx was the first philosopher of the millennium, an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Marx" is his specific name symbol in China. Marx is not only a translated name, but also a symbol with specific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at distinguishes him from the general population through language and written informati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Marx" was main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Japanese, Russian and other channels before i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t first,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Marx" appeared in the European version, and it had a variety of translation methods, reflecting different semantic connotations. Finally, the CPC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consensus, forming a consistent historical portrai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Marx" in China has promoted the recognition of Marx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The use of a un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Marx" has facilitated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to a certain extent, preserved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Marx in China.

**Key words:** Marx; Chinese translation nam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larification, Integra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WANG Yangming's Heart-Mind Theory —On XUE Kan's Unique Academic Contributions to WANG Yangming's Thought**

(By LI Chenggui)

**Abstract:** As a prominent disciple of WANG Yangming, the academic contributions of XUE Kan to WANG Yangming's Heart-Mind Theory have received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This paper, based on an examination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on XUE Kan, argues that XUE Kan has made his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Yangming's Heart-Mind Theory. Firstly, this is evident in his inheritance of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WANG Yangming's Heart-Mind Theory, such as the notion of liangzhi (innate knowledge) as an innate judgment and the foundational arguments for the philosophical view of wanwuyiti (all in one). Secondly, it is manifested in his differentiation and clarification of some of WANG Yangming's core concepts, such as "the qualifications of liangzhi as the master," the two forms of zhixingheyi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nd the concerns and philosophical realm of wanwuyiti. Thirdly, his contributions are reflected in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content of Yangming's Heart-Mind Theory, such as emphasizing the ideological aspect of zhi (extending) in zhiliangzhi (extending innate knowledge), providing ontological arguments for zhixingheyi, and defining jianzai (present conscience) as the unity of ontology and cultivation. Fourthly, his contributions are manifest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WANG Yangming's Heart-Mind Theory, using jianzai as a pivot to interconnect xinjili (mind is reason), zhixingheyi, zhiliangzhi and wanwuyiti. He succinctly expounded their complex and organic relationships, positing that xin (the mind) or liangzhi is the foundation of wanwuyiti, which in turn underlies xinjili, zhiliangzhi, and zhixingheyi. Achieving xinjili, zhiliangzhi, and zhixingheyi thus realizes wanwuyiti, thereby presenting WANG Yangming's Heart-Mind Theory in a more profound and vivid manner. Thus, it is evident that XUE Kan's academic contributions to WANG Yangming's Heart-Mind Theory are indeed worthy of recognition.

**Key words:** XUE Kan; WANG Yangming's Heart-Mind Theory; clarification; integration; consolidation

### **"New Sprouts Shooting from Old Roots": An Analysis of LIANG Shuming's Thoughts on "New Rites and Customs"**

(By WANG Junxian, DAI Su)

**Abstract:** In reflecting o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self-salvation movement, LIANG Shuming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New Rites and Customs" based on the idea of social inclusiveness in politics. The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cannot simply replicate Western legal system; it should activate the "power hidden with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roots" by revitalizing both the "resolute-ness" attitude towards lif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 ethical-based social structure. "New Rites and Customs" can thus be understood as a comprehensive concept that integrates personal cultivation (inner sagemess) with social construction (outward kingliness), which represents LIANG Shuming's unique solution for rural construction. Specifically, he advocate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hinese rationalism" to foster a democratic spirit and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the actual Chinese society. LIANG emphasizes starting from rural areas, using Peasant School as practical platforms to bring intellectuals and farmers together in villages, inspiring individuals to have noble life goals, and establishing modern organizations rich in ethical bonds.

**Key words:** LIANG Shuming; rural development; new rites and customs; national spirit